



多维切入 放眼世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于2018年10月17—18日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联合举办了“国际史与区域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多重路径学术研讨会”，来自天津和台湾众多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和专家参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贺江枫主持会议。

此次研讨会以国际史为视野，以华北区域为重点，以抗战时期为主题，强调对中国近代史的通盘串连思考，以形成民国史、区域史、抗战史研究之间的相互启示，研讨会议分五场分论坛举行。台湾政治大学刘维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瑞德、《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江沛分别主持了各分论坛，并进行相应点评。期间，学者间论点交锋时有呈现，气氛热烈。现按会议专题综述如下。

一、近现代史研究路径的反思与展望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路径，一直是个国际性的话题，究竟应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传统的研究方法？如何拓展新的研究路径？汪荣祖（台湾中央大学）的《从近代史研究的路径说起》，以新文化史为例，指出西方史学界所倡导的新文化史即起源于关注小人物的历史，以历史传记带动事件与历史的发展，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可从小人物或区域入手来反观大历史。主张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反思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话语权仍在西方的现实，认为要走出一条中国史学研究的自主创新之路，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在学习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之外，还需要提炼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李金铮以《赓续与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推动力》为题，以其多年来从事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从回顾学术史和理论方法的角度，对四十年来推动这一领域发展的动力源进行了鸟瞰式的阐述。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并非万丈高楼平地起或历史断裂之后的重起炉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历史连续性和时代背景。要充分关注已有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接续清末民国学者的研究、有选择的对待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研究的优长，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方法，百家争鸣，综合创新，才是必由之路。张思（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东亚波涛与乡野涟漪：一个华北村庄激荡的20世纪》一文中，以河北省昌黎县所藏档案及在该县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

时代村级文书资料为基础,分析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及斗争,指出东亚甚至世界的政治局势变化,也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封闭”的乡村,并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微妙影响,展示了东亚政治变动与一个小小乡土社会间相互连接的生动而具体的场景。李少兵(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世界视野下的苏州:“苏州学”的创立与江南文化研究的深化》一文中认为,苏州历史文化遗产丰厚,富有特色。在原始文献、档案搜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与海内外专家学者合作,推出《“苏州学”研究丛书》,使“苏州学”的创立水到渠成。苏州文化研究的深入,无疑会推动江南文化研究的深化。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媒体视野中的晚清澳门社会生活——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为题,以画报中披露的澳门新闻为中心,对晚清时期澳门社会的中西文化并存、传统文化与生活变迁、社会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索。他认为,作为时事画报的《点石斋画报》,对澳门故事可能有误解之处,但为读者认识世界、了解社会发展、获取社会经验、建立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供了舆论平台。王凛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情感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一文中强调,应对情感变量在历史进程尤其是当代中国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必要的考量。他认为,历史学研究仅从理性和利益来解释,忽视情感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历史的完整性。他以当代史研究为例,将情感史定义为情感参与、情感工作、情感的自身演化以及这些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强调当代情感史研究不仅史料丰富、记录方式多样,而且可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新维度、新史料和新方法,有助于人们更加完整、立体且深入地理解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

二、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向

人类历史的进程,自有文明记载以来都难以摆脱政治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基本等同于制度史和精英活动史,叙事宏观、强调自上而下,从中难以看到政治运作的奇诡多变及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关联性。本组文章,见微知著,从政治的层面、从“下层”的视角、“小人物”的视角、日常生活的视角,带来一些有益的探索。

李永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光宣之交清廷内部派大使政争史实考辨》一文,详细考证、辨析《梁敦彦档案》中《说帖》《谨将各国名儒学说摘译录呈钩鉴》两份文件,与袁世凯主张派大使的《节略》之内容、产生背景及时间,为光宣之交清廷内部围绕派大使问题发生争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证据。

张瑞德以《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为主题,从侍从室的人员、组织、功能等方面切入,揭示了隐身在蒋介石政权背后的智囊团、战时国民政府军事、政治的核心幕僚众生相,展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政治运作不为人知的一面,从中可以了解蒋介石军政统治的手段、性格及特色,更可深入了解他如何创建自己的权力分身,有效发挥其统治力量。刘维开在《蒋介石的奉化人际网络——以奉化“三先生”为例》一文中指出,蒋介石对其乡里奉化的关怀,除家族之外,还关照了一批奉化人,其中,抗战期间入侍从室编辑《事略稿本》的“奉化三先生”(王宇高、袁惠常、孙诒)为作者最为注意。文章主要叙述了“奉化三先生”参与辑录编纂《事略稿本》的前后经过。江沛提交的《“四不”主张的背后:张季鸾、〈大公报〉与民国政治的纠缠(1928—1941)》一文,通过揭示《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与蒋介石、陈布雷等人的密切关系,讨论了张季鸾以“国士”身份在九一八事变后就蒋介石对日决策出谋划策,战时又以密使赴香港与日使接触的事实,加上吴鼎昌、胡政之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新记《大公报》由此获得了国民党高层的多方关照,表面上仍维持民办身份,事实上早已违背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宗旨,在重大问题上蜕变为国民党的“隐形喉舌”。

三、区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

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区域史研究更为关注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地理空间内的诸种活动,强调特定空间内的传统和历史的作用,倾向微观、关心底层、重视社会主流的变与不变。

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上海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一文中认为,在辛亥建国过程中,上海方面明确提出了规划国家政体及先有各省代表组建临时国会,尔后组织政府的建国方案,并影响了建立民国、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全过程,为民国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邓丽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规训日常:战后上海节约运动与市民生活》,聚焦于1946—1949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节约运动在上海的反响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上海节约运动的强制性推行,将民众卷入其中并扰乱了其日常生活,加剧了失业甚至相关行业的危机,是经济治理政治化的一个失败案例。毛立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近代香港城市史图片类史料观察心得》,从所留存的历史图片中,阐述近代香港城市的发展轨迹和特征,解读了近代香港人的生活百态,也提示出近代香港发展中存在的“华洋隔阂前提下的中西合璧”“多元文化并存”等问题。张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提交的《政治与治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豫、冀、鲁三省的黄河治理》一文中,梳理了1927—1933年间,国民政府在黄河下游豫、冀、鲁三省的治水案例,系统研究了在新旧政权更迭、战乱不息、农村经济凋敝的背景下,三省的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地缘纽带、地方精英关系网以及河防的跨区域性与军事意义等条件从上级政府乃至跨越行政边界争取财政支持。郭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文《学习、审干、民主检查: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整风运动》,以罗荣桓领导的山东整风为例,指出中共的整风文化是一致的,只是不同地区因领导人掌握政策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他认为,强调在思想、组织上进行清党的山东整风运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党政军一元化在山东的推行,是中共组织的一次纯洁化运动。王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提交的《抗战时期重庆防空情报通信网的构建》一文指出,在已有电信设施的基础上,重庆防空情报通信网经过不断修整及新建通信线路,配置无线电台,逐步形成以重庆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和延伸的通信网络。该文认为,重庆防空情报通信网的日趋严密,对防空机关迅速传递各种防空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国际视野下的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千古未有之变局”,源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和西方及日本在中国的争夺及推动。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不仅要讨论传统中国自身历史及文化的前进动力,同时更要把中国近代历史放在一个国际化视野中去观察。

王文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所撰《抗战时期泰军占领云南南部》一文,聚焦于目前研究中被忽略的泰军占领中国滇南部分地区的史实,揭示出此时泰军进入中国作战的幕后缘由,在于受泰国泛泰主义思想影响。泰军入侵中国,中国远征军为保家卫国与泰军进行了殊死抗争。贺江枫的《秩序的沦陷:1934年开滦五矿大罢工再研究》一文,综合运用中、日、英多方史料指出,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位于华北非军事区的英资企业开滦煤矿1934年爆发的大罢工事件,不仅是地方性的劳资纠纷,背后更是充斥着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共、日方及英方诸力量的利益纠葛。郭循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通过题为《北洋时期地方实力派与日本陆军关系探讨——从日文史料看中国军人的形象》的论文,对比研究了北洋政坛上唐继尧、吴佩孚、冯玉

祥三个地方实力派与日本陆军间的关系,以此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日本陆军联系中国地方实力派的政策,认为因外务省的阻碍和中国政治形势变化,这一政策仅获得了表面上的效果。王美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提交的《日本的鸦片毒化侵略政策研究述论》一文,肯定了日本学界在这一问题的史料整理、专题论著上取得的系列成果。她指出,日本学界虽对鸦片政策之性质存在一定分歧,但多数学者均持“反国际法、反人道”的“举国犯罪说”,认定近代日本鸦片政策的侵略功能。

五、国际史与近代史研究

国际史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通过对多种语言的文献搜集和利用,从多种档案中爬梳出有意义的史料,并赋予研究对象以多面的解释。此外国际史的研究也有突破单一民族国家或地域认识局限的重要价值。囿于多种语言能力的要求及档案阅读能力,国际史研究的深入并非易事。

唐启华(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在题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国际史路径——以〈洪宪帝制外交〉为例》的报告中,比较中英日三国档案的记载,对长期以来视袁世凯以答应“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其帝制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除详参本国史料外,必须阅读大量外国档案史料,突破固有观念的束缚,让中国史与世界史相连接。国际史视角是值得持续开发的研究路径。潘光哲(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题为《近代日中媒体互动的历史反思》报告中,对研究近代东亚报刊史提出了具有新意的看法。他认为,近现代中韩两国报刊从日本取材者较多,报刊从业者多与日本关系密切,媒体间的互动关系值得思考。以报刊为研究对象,应放宽研究视野,从近代东亚世界彼此交缠绕结的整体场景出发,参照多国史料,辅以精细的个案讨论取向,见微知著,方能为近代东亚文化思想之互动、交流和影响的历史,拓展出更为宽广的认识空间。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特点显著:第一,会议主题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主,但上溯下延,横向触及空间大;第二,会议论文含金量高。多数作者提交的论文,是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或方向,站在学术前沿;第三,诸多议题引起与会者热烈互动和意见争锋。如袁世凯称帝的深层次原因,侍从室在国民党政制内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情感史的价值等都体现了参会学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开阔的研究视野、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以及主动创新的追求。诸多问题的思索与沉淀,对于认识目前中国近代史及抗战史研究路径多重、视野拓展、手段多元的特征具有启示性。

〔作者陶亚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春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士华)

